

北宋改革家赵抃

◎两浙人物 □叶美峰

赵抃，字阅道，号知非子，浙江衢州人。北宋景祐元年进士，官至参知政事。身后追赠太子少师，谥“清献”。历史上的赵抃，既是“纠察官邪，肃正纲纪”的“铁面御史”，也是善于治理一方的清官能吏，事迹流传千古。在赵抃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善于革新、善施仁政，形成了鲜明的为官风格。不论是正常的职务升迁，还是贬任外放，抑或临危受命，他都不辱使命，深受上下褒扬，特别是他敢想敢为、善作善成，显示了他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，被誉为“千古官守第一、千古治行第一”。

宋仁宗嘉祐五年（1053），赵抃担任泗州通判时，相邻的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发生了一件令淮南东路转运使十分担忧的事情。濠州之地，常受水患之害，百姓常常颗粒无收。濠州州守在开仓救济时，毫无章法，其中不少粮食被当地官员据为己有，士兵、百姓群情激愤。士兵谋划，要拉起队伍，夺州城、杀州官。州守惊恐，“日未入，辄闭门不出”。此事很快传到淮南东路转运使耳朵里，他想到了能干的官员赵抃，立即下文让赵抃协助。赵抃接令后深入民间、街巷、兵营，认真了解事情来龙去脉，把救济粮食公平有序发放下去。同时，他夜以继日投入工作，不急不躁，不怒而威，士兵和百姓的怨愤很快得到平息。

嘉祐元年（1056）九月，仁宗皇帝命赵抃担任睦州知州，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梅城。到任后，他照例开展走乡串户进学校，认真听取民意，从中了解到睦州每年向杭州提供肉羊，已经坚持多年。睦州属江南山水佳秀之地，此地盛产鱼米蚕茧，却没有养羊的习惯。历年来，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，去外地采购肉羊。赵抃移文杭州府，声明大宋朝廷从未下达过睦州府必须向杭州提供肉羊的旨意，睦州也无此项义务。一纸公文，就改掉了陈年旧例，赵抃的敢作敢为得到睦州百姓交口称赞。另外，睦州作为两浙路管辖地区，每年向朝廷交纳茶税，历任知州只得将任务分解到各县，催促山农们按数上缴。赵抃随即向朝廷申奏，说明睦州向来无种茶之例，朝廷遂下文免去睦州的茶税。

赵抃很早就关注到改进官吏作风的问题，明确反对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赵抃离开睦州前往西蜀担任梓州路转运使一职，后调任益州路转运使。转运使号称漕司，名为执掌一路财赋收入，实际上兼管边防、刑狱及考核地方官吏，经察访后向朝廷上报。这是他第二次入蜀。西蜀之地辽阔广袤，州县衙门之间为表示友好，官员或互相宴请，或馈赠酒食，早已成为惯例。想要煞住这股吃喝风，不借助皇帝之力很难奏效。到达益州后，赵抃专门上了一道奏章，言明不准搞互相赠酒的三大好处：一是减少公款开支，避免官员中饱私囊；二是免去差役士兵送酒礼的路途跋涉，不再以此为名征召州县人力；三是酿酒者也可免除因收不回成本反而倒贴导致贫困的情况。赵抃以身作则，很快，互相赠酒的歪风得到纠正，蜀风为之一变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赵抃向仁宗皇帝呈送《论经筵及御制宸翰》奏折：“夫帝王文章，天子翰墨，真图书之秘宝，实圣神之能事……伏望惜堂陛之崇，秘奎壁之彩，慎重命赐，杜绝奢望。”意思是皇帝的文章、天子的墨迹，自古以来就是图书中的至宝，建议仁宗皇帝不要随便答应下属们题字的要求。作为一名封建官员，赵

抃对豪华相尚的奢靡之风，提出警醒和抵制，实属不易。

在成都担任转运使期间，赵抃结识了北宋著名的“三苏”：父亲苏洵，儿子苏轼、苏辙，并郑重地向皇帝推荐了苏洵。加上翰林学士欧阳修的帮助，仁宗皇帝直接任命苏洵为校书郎，五十多岁的苏老爷子得以步入仕途。另据史料记载，经赵抃保举的官员众多，包括欧阳修、韩绛、贾黯、王陶、胡瑗、丘与、吕海、傅尧官、范纯仁、吕大防、赵瞻、马默等。在睦州任职期间，赵抃向朝廷推荐了寿昌知县郑澥、分水知县江震、建德知县周演等十一位优秀官员，并承诺如若保举的官员提拔使用后德才不佳，甘当同罪，宋仁宗当即下旨：“赵抃举荐，白纸黑字，一诺千金，全部准予录取。”由此看来，赵抃是中国倡导建立官员考察失误责任追究制的先行者。

枢密副使陈旭被降免后，赵抃也被外放改任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知州。多年来，虔州的县官们热衷于请示汇报，赵抃给他们充分放权松绑，他把下辖十县的知县集中起来交谈，让他们根据自己县里的实际情况理政牧民，不要事事上推，治理的目标是“事办而民悦”。在这样的新风下，知县们尽心尽责，虔州治内出现了太平繁荣景象。在虔州任上，赵抃着力解决老百姓的食盐问题，他向江淮路发文，从淮南运盐七百万斤到虔州，按户分给百姓。“民间足盐，寇盗自息”，百姓的食用盐问题解决了，盗版者猖獗活动得到了抑制。虔州山多林密，赵抃取州内积余之木材，打造了一百多艘船只，为已故官员的家眷亲属顺利回归故里行舟所用，并给了他们路上的盘缠，解了燃眉之急，此举深得各地官府称道。

宋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宋英宗授予赵抃天章阁待制之荣誉，令其担任河北都转运使。他任职后，在视察大名府府库时遇到了阻力。大名府主官贾昌朝，曾官拜宰相，后被贬至此。贾昌朝摆老资格，不肯接受检查。赵抃又是个忠于职守、不肯马虎的人，照章视察。贾昌朝纵有十分不快，也无可奈何。

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，该地各州郡都没有完成朝廷招募义勇的任务，按规定应受处罚的官吏人数超过八百人。赵抃上奏：不是这八百多名官吏不肯用心办事，而是百姓均在田间劳作，不肯离开丰收在望的土地。请陛下宽恕这些官吏，待农闲时我定督促完成任务。英宗皇帝同意了赵抃的请求，到了秋后，招募的任务顺利完成。

熙宁五年（1072）七月，神宗加封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令其离开青州知成都。此时的赵抃已有65岁，西蜀交通不便、环境险恶，皇帝担心他推辞，召其见面：“从先祖治下之时到如今，从成都回京再去守蜀的事，未曾有过。但是，蜀地偏远，汉族、异族杂居，是大宋十分重要的区域。赵卿能为朕分忧前往否？”赵抃爽快答应。北宋著名诗人、画家文同写下一首诗《赵大资政再任成都府》，诗之序写道：“是公二纪中四临于蜀。蜀人既闻公来，



赵抃塑像

男呼于道，女欢于灶，皆曰：‘我之七筋安于食，而枕第乐于寝者，不图今日复因于我公矣。’”可见当地百姓对赵抃的拥戴之情。文同还简要论述了赵抃重回成都之初的作为：“公既至，简条目，去苛暴，刷涤梗垢，磨荡昏翳。群疑革而冰消，大扰息而波澄。未逾月，而梁岷之下，晏然已为乐国矣。”赵抃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，使得百姓消疑去扰，社会和平安定。

赵抃不仅积极参与内政治理改革，对军队改革也有一定的思考。赵抃从西蜀返回汴京任职时，路经陕西各州县，发现各州驻扎的禁军数量很多，但各个部队却很少进行军事训练。调查发现，军队内的制度和训练已经形同虚设。主帅和一些官员还公器私用，调用禁军在自己的府邸之中从事各类杂役工作，少则几百人，多则千余人，这些士兵连规定的校阅都不用参加。赵抃返回京城之后，向仁宗皇帝上奏《论陕西官员占留禁军有妨教阅》的奏章，认为这么多杂役人员占据了军队编制，“并不预逐日教阅之数，上下顾避，递相因循，万一缓急寇警，用之御裨，何异驱市人而战？”继而明确指出：“如此弊事，非一路。”请求仁宗皇帝发布命令，“诸路敢有官员虚名占留兵级在手、有妨逐日上场教阅者，科违制之罪”。另外，赵抃针对当时全国上下大批士兵零散迁徙调防的情况，向仁宗皇帝上奏建议：一是“应拣兵路州军未发起者，且令人就在本处收管”，即禁军、厢军尚未移动者，暂停出发；二是“只许以所拣之兵……移补填临郡缺额”，使他们不必远离故地、长途跋涉，以免“携老负幼，尽室以行”的现象继续发生。赵抃在军队练兵备战、吃空饷和部队调防等方面的建议，对于保证队伍战斗力、保持人员稳定十分重要。

冯玉祥以身作则

□唐宝民

在民国年间的那些大小军阀部队中，军纪散漫是出了名的，但唯有冯玉祥的国民军纪律严明，在当时的百姓中拥有非常好的口碑。为什么冯玉祥的军队能够做到军纪严明呢？其实，这是他能够以身作则的结果。

1927年冬，冯玉祥的国民军驻扎在河南省开封县，当时的部队有个习惯，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军官们开例会。那些军官们由于自由散漫惯了，所以根本不拿开会当回事儿，以为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，因此常常有人迟到。

有一天早上，冯玉祥又照常组织军官召开例会，开会的时间到了，却有好几个军官没有来，冯玉祥大为恼怒，便当众宣布了一条纪律：“我命令，从今以后，凡是开会迟到的，我就罚他跪在主席台前，一直跪到散会为止！”

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纪律宣布的第二

给根一个扎根的时间

□任万杰

左思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，与王思道是好朋友。那时候的文人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代表作，文化圈根本让人看不起，当时赋很流行，文化人都写赋，聚会的时候拿出来展示，写得好的就会让人高看一眼。

可是每次聚会左思都没有作品，大家问他有什么作品的时候，左思就会说我要写一篇歌颂魏、蜀、吴三国都城的文章，取名《三都赋》，大家问那你写了吗？左思说我还在想。大家都认为他在吹牛，引来哄堂大笑。

经过好几年的嘲笑，身为好朋友的王思道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对左思说：“这都三年了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写成《三都赋》，但现在你没有一篇拿得出手的文章，让人嘲笑，还等什么？赶紧写一篇吧。”

赵孟頫题天宁寺

□李健

赵孟頫在湖州时，最喜欢到城西的天宁寺与长老品茗论经。长老一向推崇赵孟頫精湛的书法，多次请求他为寺院题写匾额，可不知何故，赵孟頫几次挥毫书写，总觉得自己的字偏于清瘦、力度不够。某日，赵孟頫在天宁寺用过中餐，长老请他在膳堂后面的储物间休息。因惦记着长老嘱托之事，一时难以入眠，见角落里有一张长条尉桌，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赵孟頫信手拿起旁边的抹布，在厨桌上挥洒起来，“天宁万寿禅寺”六个大字布满桌

蔡凯的仗义

□孙贵顺

明代，浙江德清县有个叫蔡凯的，家里很富有。平日慷慨仗义，经常周济贫困，扶危救难。

有一次，官府令当地百姓派人出差，解运粮食前往京城。蔡凯体谅平民的疾苦，自愿报名负责押运。当船行到运河途中时，蔡凯忽然听到邻船有人在哭泣，一打听，原来有个叫房之孝的山西人，拉了十大船的煤炭，要去京城贩卖。不料突然接到家信，说是父亲病危，要他赶快回家。房之孝眼瞅着价值二万八千两的煤炭，一筹莫展，急得直哭。蔡凯便安慰他

天早上，冯玉祥刚要去主持例会，却被一件琐事缠住了，等他处理完事情赶到会场时，发现别的军官都无一例外地到会了，而他自己却迟到了。大家都面面相觑，想看看冯玉祥怎样为自己开脱。没想到的是，冯玉祥说：“纪律既然制定了，就得照章办事，谁也不能例外，我冯玉祥作为主帅，当然也不能带头破坏规定。”说完，他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主席台前，跪到了主席台下，跪在那里主持例会。这样一直跪到会议结束，他才站起来。众军官见状都深为感动，从那以后，开例会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人迟到了，而且将士们都更加严格遵守军纪了。

冯玉祥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，对于军纪的严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。许多时候，怎么做比怎么说更有力度，当一个统帅以身作则的时候，他的部下就会被这种精神所感动，于是，一个军纪严明、秋毫无犯的军队就被打造成功了。

左思没有说什么，而是指了指自家的兰花问王思道怎么样？王思道说：“左兄养兰花堪称一绝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”左思说：“一开始我养兰花也不行，栽下去就想着开花，因此，没过几天，我就将其移植到大盆里，可是兰花的根还没有扎好，最终都死了。后来我就不心急了，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养根，兰花的根扎好了，长得强壮了，带着泥土移植，才有了今天的美好花朵。”王思道说我懂了，期待左兄的大作。这一等就是十年。

左思在这十年中，不断地构思和修改，从不拿出哪怕一句半句示人，终于成稿，一经推出《三都赋》，人人开始抄录，一时间洛阳纸贵。

有时候我们急于求成，总想着付出立刻收到回报，那样想那样做就错了，请给根一个扎根的时间，它才会回报给你一个繁花似锦。

面，雄健豪放，饱满浑厚，颇具神韵，自己也感到特别满意。他左右欣赏一番后，刚想用抹布将其擦掉，长老正巧经过，见状连忙拉住赵孟頫的手说：“如此妙笔乃天赐神助，怎能令贫僧得而复失呢？”他让人把桌面上六个大字用墨勾勒下来，将桌子的四只脚锯掉，刷漆鎏金，制成匾额高悬寺院山门上。此后，到寺院观匾者如云，无不称奇叫好，尤其是那个“天”字堪称一绝，被誉为天下第一“天”字。长老临终前特地关照继任者，将匾额上的字拓印镌刻在石碑上，作为本寺的镇寺之宝永久保存。这碑至今仍保存在湖州铁佛寺后院，供人瞻仰欣赏。

说：“你如果相信我，我将煤船一起带到京城，发卖之后，本利一块儿给你。”他又送去二百两银子，给房之孝作路费。房之孝急忙启程赶往山西老家去了。蔡凯到了京城，上交了押运的粮食，立马开始出售煤炭。时值京城煤炭紧缺，蔡凯按市价卖出，除去二万八千两本钱，又多赚了十万余。蔡凯当即赶赴山西，将买卖所得的明细账目交给房之孝。房之孝大为感动，说：“您代为经营，使我本钱不失，已经很感谢了。其余十万余两，都是你所赚的，理应归你。”蔡凯道：“我之所以替你担责，是因为你那时确有急事，并非为了要得你的便宜。”于是放下账本和全部银两，悄然离去。

刘承干和张元济的友情交往

◎史海钩沉 □蔡圣昌

一个是出身海盐的出版商，一个是在南浔的藏书家，他们之间的友情持续了四十多年。

刘承干和张元济相识于辛亥后刘承干从南浔搬至上海的时候，那时刘承干广为搜罗图书，并预备出版图书。此时，张元济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，不久又担任经理。

《张元济全集》（第一卷）收录张元济致刘承干书信254件，并附刘承干书信9件。其中第一封书信是1913年1月11日。

“兹有友人陈韞山君向业旧书，熟于版本之学。闻阁下有意收罗，愿以善本贡纳。谨为介绍。”

“敝友王佩初，湘中名孝廉也。因开矿失败，欲斥其藏书，以还逋负。昨交来宋本《吕东莱集》三册，囑呈台览，并问可否收购。渠意欲售千六百元……兄若有意，再订期相见。”

张元济生于1867年，1892年登进士，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、经理、董事长等。刘承干生于1882年，因为他比张元济小了十多岁，所以刘承干对张元济特别尊重。每一次刘承干给张元济写信，都称张元济“菊生老伯”，因张元济字“菊生”。而张元济给刘承干的书信，也谦虚地称刘承干“翰伯仁兄”，自称“弟张元济”，可见张元济对刘承干也非常尊重。

仔细阅读张元济致刘承干书信，可以发现他们的交往主要在刻书和藏书上。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先后影印出版宋槧古籍20余种，订正了许多讹误之处，而刘承干的藏书为其提供了许多帮助。比如宋本《王荆文公诗注》六册，《姚牧庵集》八册，宋本《唐书》等，都通过借阅刘承干的藏书帮助校对，得到出版。而刘承干在刻书“景宋四史”的时候，也借用了张元济汲古阁所藏宋本古籍校勘。他们的互通有无，便是文人的佳话。

刘承干有记日记的习惯，《求恕斋日记》完整地记录了刘承干每一天所做的事情，会客、访友、

购书等在日记里都有详细记录。

1941年1月，张元济因为前列腺开刀住院，刘承干赶去探望，1月2日日记载：“至大华医院望张菊生病，（因小便不通，于初二日第二次开刀），割去摄护腺，晤其郎仲木。据云，开刀后伤口出血不少。”1月21日记载：“至大华医院望张菊生病，见面后谓病已全好，饮食亦如常，惟人消瘦（轻20磅），夜间不能多睡耳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元济受毛主席邀请，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。当时刘承干在目录学、版本学方面有非常高的造诣。因为刘承干的思想非常保守。他当时马上给张元济家里打电话，张家很明确回答他，报纸所登完全属实。当他得知张元济从北京回来了，又立马赶去探望。

这是1949年10月23日下午，张元济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第二天，刘承干约了平湖绅士徐眉轩一同来到张元济家，坐定后，刘承干就迫不及待询问张元济到北京的情况，张元济告诉刘承干，他在北京和毛主席吃了两次饭，是和诸暨的周孝怀一起。张元济还向毛主席汇报江浙人民生活贫困，毛主席说，等到解放军过到南方，情况会好转。第二次吃饭时，陈毅也同座。张元济还对刘承干说，毛主席招待我们吃饭都是非常简便的中餐，盛饭也是自己盛的，哪里像我们吃饭都有下人伺候。听了张元济的叙说，刘承干感觉非常吃惊，他对共产党也有了新的认识。

张元济到北京期间，特意去拜访了一位老儒叫傅增湘。傅增湘（1872～1949），字润沅，号沅叔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进士，为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。傅增湘在目录学、版本学方面有非常高的造诣。1922年刘承干去北京为溥仪大婚贺喜，曾经跟傅增湘吃过好几顿饭，还向傅增湘赠送自己刊刻的书籍，因此傅增湘对刘承干很有好感。当时傅增湘见到张元济，就马上跟他打听刘承干的情况怎么样。当时沪上有许多老朋友，可是他唯独对刘承干特别关心，这也让张元济非常意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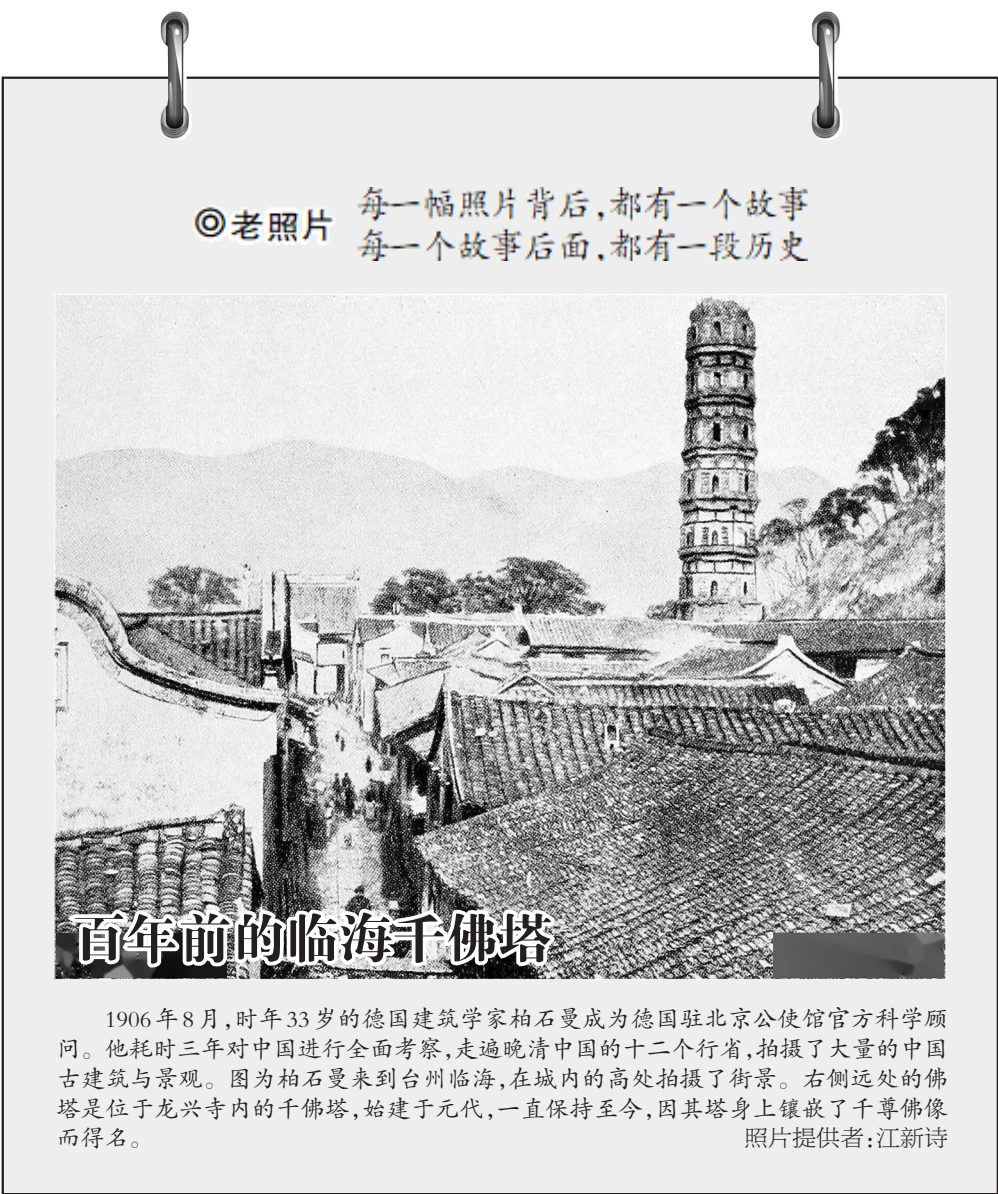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大部分知识分子生活贫困，中央决定成立文史馆，吸收部分知识分子为文史馆员，让他们发挥特长，也让他们有了一份收入。因此许多旧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能够加入文史馆。那一段时间，刘承干非常忙碌，他找张元济和周孝怀，因为他们二人担任了文史馆的馆长和副馆长，他将朋友的履历交给他们，希望他们帮助说项提名。许多旧文人知道刘承干跟张元济、周孝怀关系密切，都纷纷找他，希望他能够帮助推荐，这其中有个桐城人、国学大师叶玉麟，有嘉兴钱熊祥，有平湖葛荫梧，有老儒曹叔彦等。张元济见刘承干数次来找，以为他自己想要加入，就说，我可以帮助你提名，而刘承干知道自己条件不具备，就婉言谢绝了。

《求恕斋日记》1952年11月7日记载：“访张菊生，请其为钱冲甫（钱熊祥）等提名，渠为文史馆事并不过问，系由周孝怀、江翊云、徐森玉三人专司提名之事，若欲渠将名单转交，亦无不可。菊生初以余自己有所希望，渠愿作书推轂……余笑谢之，然盛意可感。”

1953年4月8日记载：“至周孝怀处，据谈，文史馆馆长为张菊生，副馆长江翊云、李青崖、陈巳生，评议委员会若干人，渠为评议员之一，已接到聘书……余以高吹万履历请其提名，渠谓与高吹万亦相识，许之。”

1952年至1953年间，张元济一度身体很差，卧病在床，刘承干就三天两头过去探望。如1952年4月27日，刘承干赶去探望，张卧病在床，拿出珍藏多年的银质九世祖鹿鸣宴杯给刘承干欣赏，刘承干看见上面刻着“顺治甲午顺天乡试鹿鸣宴”几个字，反复抚摸一阵。张元济又拿出“唁陈叔通丧偶诗”见赠。这些生活细节，印证了张刘二人感情弥笃。

刘承干、张元济如今都已作古，今天我们读到他们当年交往的温馨文字，依然是那么亲切，那么值得回味。



◎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，都有一段历史

百年前的临海千佛塔

1906年8月，时年33岁的德国建筑学家柏石曼成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官方科学顾问。他耗时三年对中国进行全面考察，走遍晚清中国的十二个行省，拍摄了大量的中国古建筑与景观。图为柏石曼来到台州临海，在城内的高处拍摄了街景。右侧远处的佛塔是位于龙兴寺内的千佛塔，始建于元代，一直保持至今，因其塔身上镶嵌了千尊佛像而得名。

照片提供者：江新诗